



商汤求雨

胡悦博士

在中国，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，他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精神，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学习的楷模。其实，还有一个商汤献身为民求雨的故事也同样感人，但却鲜为人知。

据古书记载，这件事发生在商汤灭夏之后。废除了夏桀的暴政，社会由困弊走向复苏，人民都盼着能过上几年好日子，谁知自然界又来作对，发生了从没见过的大旱。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，不停地在头顶上从东向西滚动，天空像水洗一般望不到一丝云彩，江河断流了，禾苗干枯了，连石头和砂粒似乎都被晒得快要熔化了。百姓们叫苦连天，举行了几次求雨的仪式都无济于事，商汤便让负责占卜的贞人卜了一卦，卦辞说：“要用人作献给神的祭品，才有下雨的希望。”这可真使商汤感到为难。他想：求雨本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活下去，怎能去残害人的生命呢？假如必须有人作牺牲，那就让我来吧！

商汤决定了的事臣下是劝阻不了的。新的求雨典礼决定在郊外的桑树林中举行。他预先派人高高地堆起一垛干柴，典礼一开始，就让祭司扶自己登上柴堆，肃穆地站在顶上向神祈祷，说：“要是我一个人有罪，就不要连累万民；要是万民有罪，那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请神放过大家，来惩罚我好了！”在商汤一遍一遍不停诉说着的当儿，成队的巫师早伴着音乐在柴堆下跳起招神的舞来。再往外围，则是人山人海的商国民众。人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点火时刻的到来。

终于等到要点火了。大祭司从祭盆里抽出火把，移向柴堆的脚下，顷刻便有几股烈焰从四面升腾上去。再看那商汤，虽已热得大汗淋漓，却依然伫立在柴堆上，一动不动。

说也奇怪，眼看火舌就要舔住了商汤的衣裾，突然有一大片乌云从东南方向飘然而来，刹那间布满天空，很快便有黄豆大的雨点劈劈啪啪地打下，接着就是电闪雷鸣，雨越下越大了。喜出望外的人们在雨中又跳又叫，纷纷仰起脖子，往嘴里接那甘甜的雨水。柴堆上的商汤也昂起头来，举目向天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脸上随之露出了宽慰的笑容。火早已被雨水浇熄，当祭司把这位敢于献身的商王扶下来时，人们围着他唱起了诚挚的赞歌，久久不肯散去。这些歌后来被称作桑林之乐。

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，商汤求雨的举动当然是可笑的迷信举动。如果大雨确实是在他求雨的时候降临，那也完全属于巧合。但透过故事本身，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，即早期的王并非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，而是立足于社会之中。他们都肩负着保证风调雨顺和农业丰收的责任，必要时甚至甘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还没有变成只知征敛赋税、挥霍享受的寄生虫。因而他们无须用强迫的手段便能在民众中获得无可争辩的尊敬。人类向下一个理想社会阶段的努力，就是要将古代

的民主、平等在更高形式上加以复活，如此说来，在今天提倡一下夏禹、商汤的献身精神，仍是很有意义的。

大者能容

胡悦博士

楚庄王与群臣饮，日暮酒酣，左右皆醉。忽然吹过一阵晚风，殿上火烛尽灭。这时有人趁机去拉王后的衣服，王后反手扯断了他的冠缨，并要求查办这个无礼之辈。庄王哈哈一笑，立即下令道：“今日宴会，务须尽欢。请大家都扯下帽带，痛痛快快地喝！”待火烛重新点燃后，在场者头上的帽子一律都不见了。于是，洗盏更酌，直喝得杯盘狼藉，主客相枕而卧。这次欢会遂号为绝缨会。会后不久，吴楚相攻，有一楚将五陷敌阵，所向披靡，为楚国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。战后，庄王奇怪地问：“我平日并未给过你什么特殊的好处，你为什么这样替我卖力呢？”此将回禀说：“我就是那个被王后扯断了冠缨的人啊！”

无独有偶，类似的事情在秦国也有一件。秦穆公丢失一匹良马，司马监侦知已为岐山下的村野之人所偷食，穆公立即派随从送去几担美酒，并下令说：“吃了骏马的肉而不喝酒，是会伤身体的，快点分着都喝一些吧！”过了一年，秦晋战于韩原，晋将梁由靡率众围穆公之车，情况紧急万分。忽然，西南方向

上旋风般地卷过一队徒兵，个个手持利刃大斧，见人便砍。晋军支撑不住，竟如潮水般地退下，秦军反败为胜，还俘虏了晋惠公。秦穆公惊喜之余，派人去查，原来这群靠步战却敌的英雄，正是那些偷杀了他骏马的岐下乡民。

楚庄秦穆都因大能而容获报，因此，后人纷纷效法，几乎成为风气。西汉初，袁盎曾为吴国相，相府一小吏与盎妾私通，盎知而不宣，遇之如故。小吏心虚而逃，盎亲追之，并以妾赐小吏，要他继续任职。吴楚七国反叛时，汉景帝派袁盎以朝廷使者的身份，出使吴国，劝吴王投降，吴王刘濞反囚袁盎于军中，准备第二天处斩。夜间，负责守卫的校尉将守卒灌醉，以刀决裂军帐，亲送袁盎，冒死逃出。夜黑如墨，相互辨不清面貌，但从声音判断，袁盎猜出现在的校尉就是从前吴国相府的小吏。还有一位韩安国，在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手下作官，突然犯了法，被关在监狱里，狱吏田甲对他百般凌辱，韩安国说：“死灰还可以复燃 你就不怕有一天我再得势 会报复你吗？”谁知田甲嘴巴更硬，竟厉声道：“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！”没过多久，死灰复燃的话应验了。景帝下诏拜韩安国为梁国内史，阶下囚一夜间变成了俸禄二千石的大官，田甲吓得屁滚尿流，慌忙弃职而逃，韩安国放出话来说：“田甲要是不回来继续任职，我就杀他全家。”不得已，田甲只好向韩安国内袒谢罪，韩安国笑道：“你以为我真的会报复你吗？”田甲将信将疑地仍去作狱吏，后来发现，韩内史居然始终待他非常好。

容人不易，容忍伤害过自己的人更不易。古代剥削阶级中的优秀人物尚且能够作到，我们今天的干部更应有此雅量。然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却有一些领导惯于抓住同志的一点小错，乱打棍子，乱戴帽子，至于那些与自己有过芥蒂的人，对不起自己的人等等，则更要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心胸如此狭窄，怎能实

现安定团结，凝聚更大的力量，投入到开放改革的宏伟事业中去。古人云：“大者能容”。又曰：“察渊中鱼不祥”。愿我们的社会出现更多能容人而不察小过的“大者”，那样，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，就更有望了。

古人重直谏

胡悦博士

国家是由原始氏族组织直接脱胎而来的，因此，在早期国家阶段，社会政治生活中很自然地保留有大量原始民主制的残余。那时候，不仅自公卿至于列士，可以用献诗的形式自由发表政见，就是庶人百工，也可向天子传语，以述说生活中的疾苦。后来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，原始民主制的影响日渐消退了，但凡是有作为的国君，仍无不深知直谏的重要性。

赵简子有个臣下叫周舍，生前最好直谏。他死后，简子每次听朝，总是满脸的不高兴。大夫们都以为是自己作错了事，纷纷上前请罪。简子说：“各位并无什么过失。只是谚语中有这样一句，叫作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你们来上朝，我仅能听见一片唯唯诺诺，再也听不见像周舍那样激烈的争辩声。我是在为赵氏的前途担忧啊！”狐狸腋下的部位是最珍贵的皮货，赵简子引俗谚作比，显然是认为只有直谏之臣才算是国家的栋梁。

正因为如此，最敢直谏者，往往也能赢得明君的最大尊重。汉高祖时，有御史大夫名周昌，为人坚毅质直，自吕后、太子

及萧何、曹参诸大臣，皆素敬惮之，连皇上本人也畏他三分。一次，周昌入内宫奏事，高祖正搂着戚姬亲热，周昌见状返身退走，不料汉高祖却紧追上来，用手按住他的脖子问：“依你看，我能算个什么样的君主呢？”周昌仰首高声答道：“陛下生活荒唐，我看正是桀纣一类的帝王！”高祖心中不悦，却也只能一笑了之。后来，为废立太子的事，他又在朝廷上强争，曰：“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若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”周昌有点口吃，司马迁记此事时，用了“期期”两个象声词，把这位直臣因盛怒而愈加结巴的样子形容得维妙维肖。也正因为周昌以敢直谏闻名当世，所以高祖临终前，便把他任命为赵相，让他作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赵王如意的保护人。

还有一个汲黯，汉武帝时人，也是好直谏的典型。武帝好大喜功，与民争利，却又推尊儒术，标榜仁义，汲黯便当面质问道：“陛下的欲望如此之多，为什么还偏说是在学习尧舜、施行仁政呢？”武帝气得默不一语，当即示意罢朝。群臣替汲黯捏着一把汗，都围上来埋怨他。汲黯却分辩说：“朝廷设置公卿大臣，难道就是让咱们专门阿谀奉承，把天子往不仁不义的邪路上引吗？”武帝虽一时生了气，但心里反而更赞许汲黯，把他视为社稷之臣。大将军卫青、丞相公孙弘等到内宫晋见，武帝或斜倚在床边，或连帽子也不戴，随随便便地就见了，若逢汲黯来，则非要穿戴整齐不可。一次，汲黯进来得有点急，武帝忙让人先招呼着，自己躲入帐后，待收拾好了才出来接见。皇帝的庄重态度，已说明汲黯在朝廷中具有崇高地位。

所谓直谏，就是直截了当地发表不同见解。古代的帝王为了改进统治办法，巩固统治地位，尚且能够重视谏臣，我们共产党人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，当然就更没有理由把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。可是，由于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在
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仍可见到少数领导不善区分香臭，长的是顺风耳，只喜欢吃顺气丸，终日被阿谀奉承者送上的迷魂汤灌得晕晕乎乎，反把一切持不同观点的人视为异己，大加排斥，此类作法怎能不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呢？诚望这篇小文能成为一付解毒剂，使那些只喜欢听奉承话的人读后有所清醒。

史官的责任

胡悦博士

《古人重直谏》发表以后 几位读者来信询问周舍其人其事。非常可惜 古书对这位著名谏臣的记载并不多。《韩诗外传》说他整天操持着笔墨简牍，随从在赵简子之后，“司君之过而书之”，日有所记，月有所成，岁有所效，给主人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，依此分析，我推测他应是赵氏朝廷中的史官。

我国早有史官制度，据说国君说的每一句话要由左史记录下来，国君所作的每一件事，要由右史记录下来，这便叫作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行”。如此不惮其烦的目的何在呢？古人也讲得很清楚：第一是促使国君谨言慎行；第二是为民众和后世树立可资仿效的法式。可见那时史官的责任非常重大，他的工作直接影响着国君的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，实际上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。

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古代的史官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。他们敢于坚持原则，秉笔直书，为了捍卫各自心目中的真理，甚至不惜献出生命。

我们且举两例来看一看史官的可贵精神吧！

晋灵公荒淫无道，晋国的正卿赵盾屡谏无效，还险些遭到灵公的暗算，不得已，他离开了都城，打算逃出国去。谁知刚走到半道，就传来了新消息，他的本家弟弟赵穿杀死了灵公。于是，赵盾便立即返回，拥立了晋成公，自己仍作正卿，并因匡复社稷有功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。可是，太史董狐却在简牍上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五个大字，广泛昭示于朝廷，弄得赵盾十分难堪，便忍不住争辩道：“杀人的并不是我呀！”董狐丝毫不肯示弱，他当着众人慷慨激昂地反驳说：“你是国家的正卿，逃走时并没有离开国境，回来后也不追查凶手，怎么能推卸掉杀人的罪责呢？”当时，赵盾在晋国权倾朝野，董狐却敢于直书其过，还坚持不予更改，这的确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。

另外一例出自齐国。权臣崔杼杀死了齐庄公，另立景公为君，自己和同党庆封分别作左右相，把持齐国朝政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不料，某一天他到太史府观书，却见他的罪行一条一款都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国史上。崔杼勃然大怒，立即将太史杀死，令人把有关的简牍刮去。可是，没多久，太史的弟弟又把刮掉的部分补写上了。崔杼气得又接连杀掉两个人，但太史的兄弟们仍是前仆后继，始终不肯退让。最后，连杀人不眨眼的专权者也手软了，只好收起屠刀，听任太史的幼弟如实补写。这位小太史记完崔氏之罪刚出宫门，迎面碰见了南史氏，他听说太史家的人已被杀光，就抱着竹简赶来接替。看来，即使太史的幼弟也被崔杼杀死，齐国的史学传统照样不会断绝。

晋董狐、齐太史被孔子誉为良史，他们的写史原则也被归纳为“书法不隐”。这种可贵的作法为后世许多优秀史官所继承，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便贯穿了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求是精神，因而才成为“史家之绝唱”，范晔的《后汉

书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等等，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我国史学的良好传统。然而，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，写史者的队伍也是泥沙俱下，某些史官为权势名利所左右，利用手中的史笔篡改历史的现象产生了。如北齐的魏收就公开宣称：“什么没眼色的东西，敢跟我过不去。我在史书中要抬举你，可以使你升天，要贬斥你，可以使你入地！”由于他以个人的爱恶为褒贬，所以他著的《魏书》历来被视为“秽史”。其它人虽不及魏收这么典型，但任意涂抹的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，以至于有位近代学者竟把历史说成是任人打扮的婢女。史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，历史的价值自然就会被忽视。

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既需要提醒人们以史为鉴，走好今天的路，更需要总结历史的规律，照亮明天的航向，真可谓任重而道远，但如果缺乏责任感，则又必将贻害无穷。有人说目前历史学正在衰落，我认为只要我们树立起责任感，勇于写真历史，史学的价值并不难被发现，所谓史学危机也不难挽救。因此，是继承古代史官的优秀传统，去作求是的良史，还是步魏收之流的后尘，去写“秽史”，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作出认真的抉择。

话说“上下其手”

胡悦博士

公元前 547 年，楚康王亲率大军围攻郑国的城麇。楚将穿封戌虏郑守将皇颡。王子围却与之争功，硬说俘虏是由他抓获的。楚康王无奈，只好让手下的执法官伯州犁去负责查证。伯州犁令人把皇颡带到面前，高高地扬起手，指着王子围说：“这位大人是我们君王的爱弟”，又把手放下来，很随便地指指穿封戌说：“这位呢，是我们楚国方城北边一个地方上的县尹。你到底是败在谁的手下了呢？”皇颡看着他的精彩表演，心里早已明白了八九分，便胡乱朝王子围所站的一边点点头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好像就是被他一戈打下车来的。”于是，不管穿封戌如何不满，功劳还是记到了王子围的头上，并由此留下了“上下其手”这个成语。

中国的古文化很耐人寻味，好的东西有人继承，不好的东西也甭愁断了线。自从伯州犁发明了“上下其手”，此种手段竟

很快传播开来，成了贪官奸吏欺上瞒下、从中作弊的惯伎。

战国时期，楚王大会诸侯，鲁国、赵国都送了许多酒来作贡品。鲁国的酒寡淡无味，赵国的酒却醇香甘冽。主管收受贡物的官想向赵国要几坛回去自己喝，赵国的使臣硬不答应。到了大宴宾客的一天，这位官员竟暗中用鲁酒冒充赵酒送上去，楚王喝了，非常生气，立即决定派兵攻打赵都邯郸。由此可见，楚国本土就有不少伯州犁的“嫡派传人”，他们“上下其手”的本领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

“上下其手”不仅常被用来害别人，甚至也被一些下属用来坑害自己的主子。宋、郑将战，宋国主帅华元杀羊飨士，不知怎么搞的，竟忘了把羊肉汤分给自己赶车的羊斟。这羊斟也算是有能耐，当时心里虽气得不行，嘴上却一声没哼。等到了阵前，只见他双手握住缰绳猛地上下一抖。四匹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带着华元，直接朝敌人最多的地方冲去，而宋国的大队人马则远远被抛在后边。此次战争中，不仅华元被俘，宋军也被杀得落花流水。羊斟“上下其手”的招数可真有点太狠毒了。

我们不难发现，使用“上下其手”的办法整人的多是中下级官吏，他们权力不一定很大，但因是在暗中作手脚，不易被主子觉察，所以往往能够产生极大的坏作用。这就说明，统治者用人不慎，是“上下其手”风气得以绵延的根本原因。反之，如果坚持选用正人君子作臣僚，此类事情恐怕就要少得多。

今天，在有些地方，广大群众仍反映说：“上边的经是好的，却让下边的和尚念歪了。”为什么会念歪，我们应当分析，其中可能有水平问题，有认识一时跟不上的问题，但是否也有人诚心“上下其手”呢？希望领导和群众都要擦亮眼睛看一看。

“冰山”小议

胡悦博士

古人喜交游，但有以义合，有以利合。以义合者，主客推诚相见，情意久而弥笃。以利合者，今日将你敬若神灵，明日就可视同路人，交游已不过是趋炎附势者手中的一件工具。

孟尝君礼贤下士，家有门客三千人。后来，他因故被齐王免去相职，众客即纷纷背之而去，气得这位贵公子发誓要“唾客之面而辱之”。汉武帝时，郑当时好学游侠，接纳天下宾客，夜以继日，从不懈怠，天下士人亦争附之，号称“行千里不赍粮”，意谓到处都有管饭的朋友。然而，他一旦失去九卿的高位，肯与之来往者也马上变得寥若晨星。还有下邳县的一位翟公，在武帝元光年间曾作到廷尉，一时宾客盈门，甚是风光，及被罢免，门外竟可安设雀巢。说来凑巧，不久皇上又准其复职了，于是，一些旧宾客跟着就胁肩谄笑地卷土重来。翟公的心中真是酸甜苦辣，什么味都有，想了想，便提起笔，在自家的大门上写下了几句话，叫作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翟公可算是把古代社会的炎凉世

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不过，许多事实告诉我们，趋炎附势者的下场往往不一定都很好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些人心目中只有一个利字，早把真理和正义抛却了。而真理终将战胜谬误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却又是历史的必然。

春秋时，范宣子一度任晋国的中军帅，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，董叔便向宣子的女儿求婚，指望攀上一门好亲戚。叔向劝他说：“范家太富，你恐怕侍候不了人家的姑娘，不如趁早罢休。”董叔却答道：“我不就是要借此建立联系，以便在政治上得到他家的提携吗？”果不出叔向所料，婚后不久，范氏姑娘即嫌丈夫对自己尊重不够而向父兄投诉，范家立即派人把新女婿抓来拴在院子里的槐树上，正好叔向由此走过，董叔便托他向范宣子求求情，叔向说：“你想同权门建立联系，现在已被系上了，还找我干什么呢？”幸福的婚姻都以情爱作基础，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法则，董叔却公然对此弃之不顾，赤裸裸地把通婚当作自己向上爬的阶梯，他很快便遭拘系，当然只能叫作活该。

唐玄宗时，因为杨贵妃的关系，杨国忠被任为宰相，杨家的权力达于鼎盛，四方之士争趋其门，唯有进士张彖不肯攀附，他常对人说：“你们投靠杨氏，自以为稳如泰山，以我之见，这不过是座冰山罢了。一旦红日高照，冰山消融，恐怕会耽误各位前程的！”但是，众人多半都因党附权贵而尝到过甜头，谁还肯来听他的高论？有人竟至认杨贵妃为母，或者便去拜杨国忠为父，一时间，闹得乌烟瘴气。

岂料很快就是安史之乱，杨氏兄妹双双死于马嵬坡，杨家党羽也顷刻作鸟兽散，几个首要分子刚逃至陈仓，即被县令薛景仙率众捕杀。张彖“冰山误人”之语没用多长时间，即完全得到了验证。